美索不達米亞文明的誕生

劉　景　輝

一

美索不達米亞(Mesopotamia)一詞是由希臘字「河」(Potamos)與「中間」(Mesos)兩字組成，意思是河中間的地方。希臘人所謂的「河」是指底格里斯河(Tigris)與幼發拉底河(Euphrates)，河中間就是指這兩條河中間的地方。至於是這兩條河中間好大的地方，古希臘人的文獻並沒有明確的記載。歷來的歷史家也很少能够將美索不達米亞的範圍予以確定，所以美索不達米亞究竟是一個好大的地區，大家的觀念總是模糊的與籠統的居多。將美索不達米亞給予一個明確的地理範圍的，既不是一個專業歷史家，亦不是一個專業地理家，而是一個專業醫學家兼業餘歷史家的法裔英籍的洛克斯博士(Georges Roux)。[1] 他在**古代伊拉克**一書中說；[2] 希臘歷史家將美索不達米亞解釋成兩河中間的地方實在太拘泥了。他認爲美索不達米亞是一個包括面積達336,700平方公里的三角形地區。大約是臺灣本島面積十倍(臺灣本島面積是35,760平方公里)。這個三角形的頂角在今天伊朗境內的烏爾米亞湖(L. Urmiah)，它的兩角分別在西方的阿勒坡(Aleppo)，與東方兩河的交滙處，卽夏特·艾爾·阿拉伯河(Shatt-el-Arab)的河口。它的底邊是幼發拉底河，中心部份是幼發拉底河與底格里斯河兩流域。(參看地圖一)。這個三角形地區，大部份是在今天伊拉克境內，小部份是在敍利亞境內，土耳其與伊朗亦各佔有一部份。洛克斯的解釋是比較明確的，也是可以接受的。因爲人類文明初期的重要活動都在此一區域發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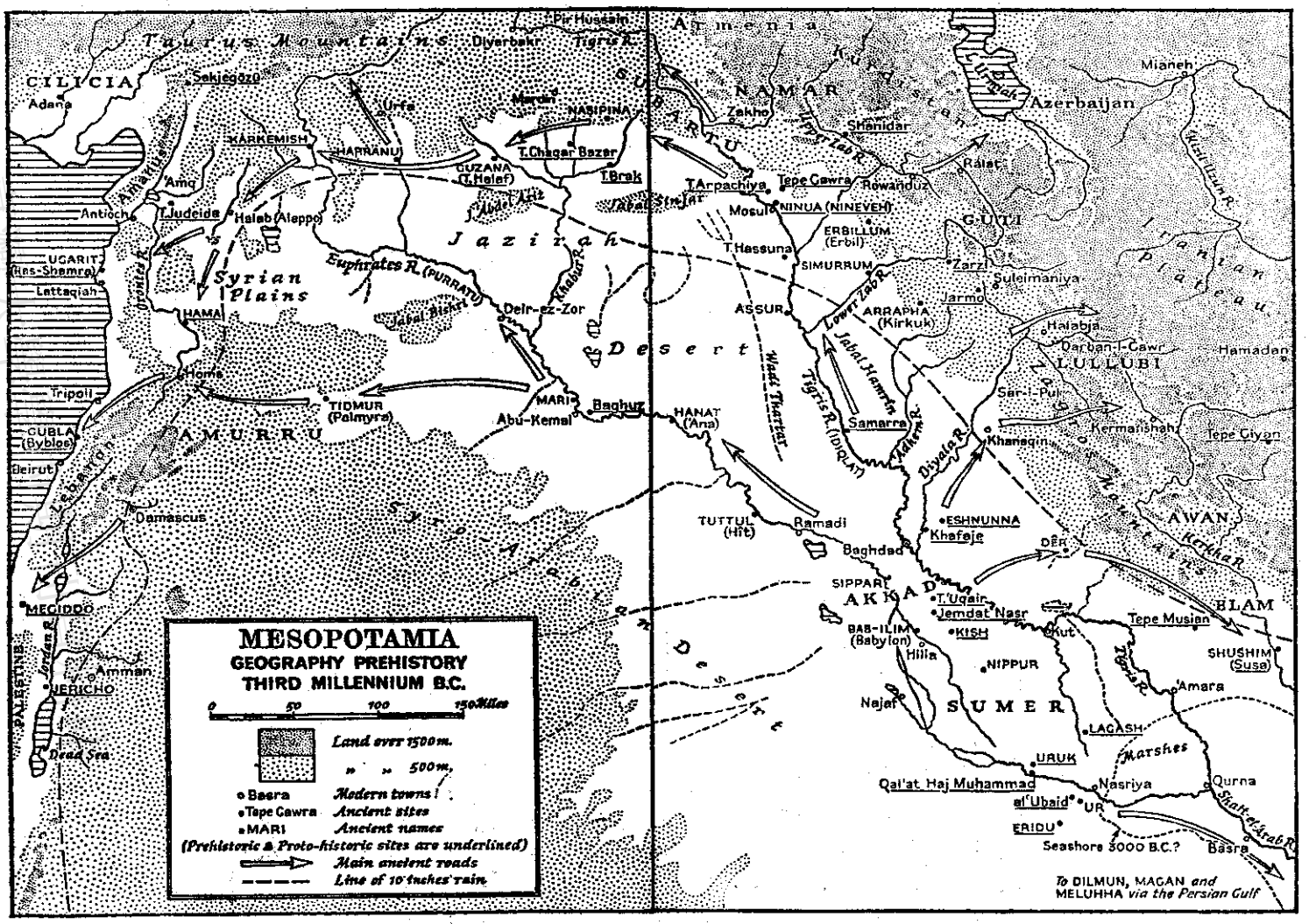
底格里斯河與幼發拉底河都發源於亞美尼亞(Armenia)。底格里斯河發源於亞美尼亞的萬湖(Lake Van)之南，幼發拉底河則發源於亞美尼亞的亞拉臘山(Mt. Ararat)附近。聖經創世紀八章四節說挪亞的方舟，停在亞拉臘山上。挪亞的方舟，是否停泊在亞拉臘山不得而知，但是亞拉臘山是此一地區最高的山，殆無疑問。亞拉臘山高出海平

---

[1] 洛克斯博士1914年出生於法國。父親是法國陸軍的軍官。洛克斯自九歲起曾隨其父母居住敍利亞與黎巴嫩長達12年之久。1935年返到法國後，在巴黎大學習醫，畢業後並在巴黎行醫。但是他對古代近東歷史研究興趣極濃，假行醫之餘暇，在巴黎各大博物館從事古近東史的研究。自1950年起，他擔任伊拉克石油公司(Iraq Petroleum Company)醫生，在伊拉克居住了七年。在這期間，他寫了不少學術論文，投在研究「蘇美」與「亞述學」諸刊物上，使他在專業的考古家與亞述學家之間有了相當崇高的地位。他所做的原始研究，主要是南美索不達米亞。洛克斯現在與他的英籍妻子居住在倫敦。他所著古代伊拉克(*Ancient Iraq*)自1964出版以來，一直是一本暢銷的學術論著。

[2] Georges Roux, *Ancient Iraq* (Penguin Book, 1972, England) p. 18.

美索不達米亞形勢圖



引自 Ancient Iraq 頁 459–560

面 5,165公尺，山頭終年積雪，充滿神秘氣氛。底格里斯河全長 2,045公里，支流有四：上亞比河 (Upper Zab)；下亞比河 (Lower Zab)；亞德翰河 (Adham)；與狄亞那河 (Diyala)。在離波斯灣約 190 公里處，幼發拉底河來會，形成夏特·艾爾·阿拉伯河。底格里斯河沿岸有古代名城尼尼微 (Nineveh) 與巴格達 (Baghdad)。

幼發拉底河全長3,380公里。自亞美尼亞流經安那托利亞 (Anatolia) 高原東部高山地區之後，始折向南流入敍利亞 (Syria)，在敍利亞境內改向東南流，幾與底格里斯河平行。兩河之間的最窄距離約四十餘公里，在巴格達附近。最後，幼發拉底河與底格里斯河合流，注入波斯灣。幼發拉底河在敍利亞境內距離地中海最近處不過 160 餘公里，其最大的支流名哈布爾河 (Habur)，沿河著名的古城有馬里 (Mari) 與巴比倫 (Babylon)。在美索不達米亞境內的兩河河道，大體上形成兩種不同的景觀。它們的分界線是在喜特 (Hit) 與沙馬拉 (Samarra) 之間。在這條線以北，兩河河流穿山裂石，懸崖夾岸，故河道歷久不變，故名城如卡爾克米什 (Karkemish)、馬里、尼尼微、亞述爾 (Assur) 等至今猶鄰接河道。但在此線以南，景觀廻異。兩河河道曲折異常，支流繁多，形成了寬廣的與平坦的冲積平原。有時候，這個冲積平原不妨稱之爲美索不達米亞三角洲 (Mesopotamia Delta)。此處因河道曲折異常，地勢平坦，所以河水常溢出河道，造成了河道的改變，以及湖泊與沼澤的出現。這也說明了今天在南美索不達米亞地區所挖掘出來的遺址，爲什麼常常不在現代河道兩傍的緣故。[3]

這一個冲積平原是如何形成的呢？西元一世紀羅馬科學家大普林尼 (Pliny the Elder A.D. 23–79) 在他的**自然史** (Natural History) 上說，在史前時代，波斯灣頭曾深入巴格達一帶，後來經過數萬年兩河淤泥的沉澱，在史前時代的末期終於形成了這冲積平原。[4] 這種解釋在二十世紀初被廣泛地引入歷史教科書中。即使今日的學者有了不同的見解，這種理論在多數的教科書中仍盛行不衰。1952年地質學家李士 (G. M. Lees) 與法爾孔 (N. L. Falcon) 在一篇名叫「美索不達米亞的地理史」[5] 論文上說，兩河淤泥沉澱的速度極爲緩慢，今日波斯灣頭與史前時代並無顯著的差異。他們提出的新理論，普遍地爲地質學家所接受，但是大多數的考古學家仍存疑。主要的原因，考古學家在近波斯灣口之處，尚無發現人類的遺址和遺物，足供印證。比較合理的解釋是，巴格達以南至兩河會合一帶的冲積平原在史前時代就已形成了，但是夏特·艾爾·阿拉伯河却是古代以前未曾有的河流，在古代，兩河是分別直接注入波斯灣的。因此，夏特·艾爾·

[3] *Ibid;* p. 20–21.

[4] Pliny, *Natural History;* VI xxxi, 13.

[5] G. M. Lees and N. L. Falcon, 'The geographical history of the mesopotamian plams', *Geor. Journal,* CXVIII (1952), I, pp. 24–39.
以上兩註係轉引 *Ancient Iraq*, Chapter I，註[5]及註[6]，見 *Ancient Iraq*, p. 394.

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阿拉伯河及其附近的陸地很可能是在歷史期形成的。今日波斯灣頭一帶，沼澤遍佈，人跡罕至。這種推論似乎比較適合歷史的發展的脈絡。當然，眞正正確的解釋，尙有待地質學與考古學進一步的研究。[6]

整個美索不達米亞以其自然景觀的差異，可以分成五種不同形態的地區。第一種卽兩河之間的冲積平原——美索不達米亞三角洲，這是美索不達米亞的核心。第二種是沙漠；第三種是草原；第四種是山麓；第五種是沼地。茲分別說明如下。

美索不達米亞三角洲卽是美索不達米亞文明的誕生地，三角洲的氣候是一種屬於乾燥性的亞熱帶氣候，炎熱乾燥，夏季的平均氣溫是攝氏30°至37°，最高時可達攝氏50°。（比較臺灣夏季的平均氣溫攝氏 27°至32°），雨量稀少，僅在冬季時降有微雨，冬季的平均雨量亦不足 150公厘。（比較臺灣西海岸的年平均雨量1,200公厘）。所以，農業幾乎完全仰賴灌溉；在農業灌溉尙未發明之前，那就依賴河水的泛濫了。然而，兩河流域的泛濫對於農業的直接效益却幾近於零。其原因：(一)兩河泛濫的時間不適於播種，兩河泛濫的時間是在每年的四月至六月，對冬季作物而言太遲；對夏季作物而言太早。兩河泛濫之所以發生在四至六月，是因爲亞美尼亞（卽兩河上游）山區冬季積雪融化與春季豪雨的關係。(二)每年泛濫水量之大小，完全無法預測，這是因爲山區的雪量與雨量都不固定。因此水量大時，往往造成廬舍蕩然，孤鴻遍野的淒涼景象。要使兩河河水泛濫有助於農業生產，必須要懂得灌溉；懂得灌溉意思是人類懂得用自己的智慧去征服大自然了。美索不達米亞人們懂得灌溉正是文明出現前夕的事。但是洪水之爲患，究竟未可先卜，因而對自己之生命財產的安全，缺乏自信，美索不達米亞人們的悲觀思想於是形成。[7]

兩河河水泛濫，雖然有上述之二種缺點，但是它的優點却仍然是值得注意的。第一，洪水的泛濫，給原來的土地，帶來了大量的淤泥，這種淤泥的肥沃性很高，適合於農作物的生長，尤其在古代，南美索不達米亞的土地尙未鹽化之前，它的生產量是相當高的。第二，一般性的泛濫，如能因勢利導，尙可爲人們所控制；所謂因勢利導，卽是建立良好的灌溉制度與排水與蓄水設施。第三，洪水的泛濫，是年序變化的一部分，因爲它是一年一度的。雖然洪水的泛濫，給美索不達米亞人帶來了悲觀的思想，但是它也賦予了再生的意義。[8] 洪水泛濫的地區就是美索不達米亞三角洲。所以使三角洲地區農業的發展有了優越的先決條件。三角洲地區不僅適合於穀物的生長，也適合於棗椰的繁殖，因此，穀粒椰子成爲美索不達米亞人們的主食。此外，三角洲地區也盛產魚類、蔬

[6] Roux, *Ancient Iraq*, p. 21.

[7] *Ibid*, p. 22-23.

[8] Milton Covensky, *The Ancient Near Eastern Tradition*, New York, 1966, p. 13. 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菜、果物等，人們進入歷史期後，也豢養牛羊。因此，除了在戰爭與自然災難期外，美索不達米亞人們的生活一般都比較富裕。他們比同時代居住在敍利亞、伊朗、小亞細亞的人們要好得多。文明就是從這樣一個地區最早發生的。[9]

美索不達米亞的第二種地理形態是沙漠。它主要位于美索不達米亞西部與南部，是敍利亞——阿拉伯沙漠（Syro-Arabian desert）的一部分。兩河流域與沙漠的接壤處，卽農業民族與遊牧民族各自活動的分界線。美索不達米亞歷史上著名的蘇美人卽是定居在冲積平原上農業民族。而阿莫瑞特人（Amorites）與亞蘭人（Aramaeans）原是沙漠邊緣一帶的遊牧民族，後來，他們漸漸由沙漠邊緣刼掠農業區的農業民族，並且由沙漠邊緣移居農業區，成爲美索不達米亞人的一份子。美索不達米亞古史上充滿這類遊牧民族與農業民族的鬪爭史。沙漠的地理形態雖然在美索不達米亞的西部與南部很明顯，然而在三角洲地區內，仍有不少的零碎的沙漠景觀。此類地帶，人煙罕見，極爲荒涼。[10]

第三種地理形態是沼地。沼地分佈在美索不達米亞三角洲的南端。它與美索不達米亞其他各區的景象差別極爲懸殊。此處有無數的淺水湖，湖中蘆葦叢生，不利航行。沼地內多水牛、野猪、野鳥等野生動物，且蚊蟲遍佈，天氣鬱悶，令人有窒息之感。此處不僅開發不易，且不適宜於人類之生活。故自古以來，人跡罕至，絕少人類聚落。沼地大約是由兩河的淤泥逐漸沉澱堆積而成。故考古家在此一地區尙未發現人類聚落的痕跡。[11]

第四種地理形態是草原。草原位于美索不達米亞的西北部。阿拉伯人稱之爲艾爾·結齊拉草原（el Jazirah）。在草原的北端，底格里斯河與幼發拉底河相距四百公里。幼發拉底河的支流哈布爾河與卡哈布河（Khabur）流經其上。除了這二條大河橫貫草原之上外，尙有許多小溪流遍佈草原各地。此處的冬季雨量較多，且附近山區積雪融化之後，本地的水量更爲充沛，故整個草原水草茂盛。因此，草原之上極適合於牛、羊、馬的放牧，農業發展之後，多種植玉黍蜀，果類的種類多而產量大。這個地區是很適合於古代人類居住的。考古家在此草原地帶發掘不少人類早期聚落遺址，足證此處古代人煙稠密。結齊拉草原於農業、畜牧業上有重大作用之外，在交通上，它也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它是底格里斯上游與北敍利亞平原之間的「陽關大道」，換言之，它是這兩地區之間的天然走廊。[12]

第五種地理形態是山麓。它是在美索不達米亞這個三角形的右部，卽今日伊拉克的東北部。它左起底格里斯河中、上流域，右止於庫達斯坦（Kurdistan）地區的高山以

[9] Roux, *op. cit.*, p. 24.

[10] *Ibid.*, p. 25.

[11] *Ibid.*, p. 26-27.

[12] *Ibid.*, p. 25-2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及札格洛斯山（Mt. Zagros）的西麓。庫達斯坦高山與札格洛斯山是今日伊拉克與伊朗之間的界山。底格里斯河的四大支流全部分佈在這個地區內。山麓的地形是西低而東高，它是以梯形的方式而向東逐漸增高的。這個地區夏季炎熱，但冬季並不寒冷，而是涼爽，年雨量較三角洲豐富。山麓中有草地，有橡樹林與松樹林、大麥、小麥、葡萄樹、蔬菜、果樹亦雜生其間。在人類不懂灌溉技術的時代，它是史前人的洞天福地，是新石器時代近東的農業發祥地，也是後來亞述王國的核心。在美索不達米亞的歷史上，它的重要性不下於三角洲地區。這是一個特別值得考古家、歷史家研究的地區。下文中論及近東農業起源時，主要就是討論這一地區早期農業發展的情形。因爲這個地區介於伊朗高原與美索不達米亞三角洲之間，故成爲伊朗高原民族與美索不達米亞民族之間的一個主要衝突的地區。[13]

以上是就美索不達米亞的地理形態所作的分類。對於本研究而言，以山麓地區與三角洲地區最爲重要，山麓地區是新石器時代農業的發祥地，三角洲地區是文明的肇造地。本文就是研究新石器時代人類如何由初發的農業演進到文明的出現的過程。換言之，就是要說明初發農作如何在山麓地帶興起，文明如何在三角洲地帶出現。若是就美索不達米亞的歷史發展來看，美索不達米亞又可分爲北美索不達米亞與南美索不達米亞。北美索不達米亞包括山麓部分，草原部分和沙漠部分，它又可稱之爲亞述（Assyria）。南美索不達米亞包括三角洲部分和沼地部分，它又可稱之爲巴比倫（Babylonia）。巴比倫又可分爲南北兩部分，北部叫阿卡德（Akkad），南部叫蘇美（Sumer）。文明最早就是在蘇美境內產生的。

二

本文的標題是「美索不達米亞文明的誕生」，美索不達米亞的地域問題已經在上節作了詳細的說明，「文明」的定義必須要在本節作一解釋，不然，這篇文章要討論什麼問題就弄不清楚了。「文明」（Civilization）雖然是歷史學家，人類學家及其他許多社會科學家廣泛使用的一個詞彙，不幸，它却沒有一個簡單的和固定的意義。[14] 這個詞彙

[13] *Ibid.*, p. 26.

[14] Civilization 是很難下定義的名詞，1959年，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部曾出版 *Civilization* 一書，這本書包括七位名學者的論文。茲將其七篇論文題目錄出，以見本書之規模，以及解釋 Civilization 一字之困難。

V. F. Lenzen, Science and Social Context
Stephen C. Pepper, The Conditions of Social Control
George P. Adams, The Idea of Civilization
D. S. Mackay, Organization and Freedom
Edward W. Strong, Civilization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A. I. Melden, Judgment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William R. Dennis, Conceptions of Civilization

臺灣大學藝術期刊資料庫

不僅是非知識份子不了解，即使是知識份子恐怕亦不容易把握它的內涵。其所以如此，主要的原因在於它有三種不同的用法。第一種用法表現在「文明人」這種語句中：我們說「他是一個文明人」的時候，表示承認他有良好的風範，做事情有他一套規則，與他人爭辯的時候，決不會臉紅脖子粗，一言不合，動手與人打架，而是以一種溫和的態度訴諸於理性的說明。事實上，「文明」最初的定義就是這種意思。它是在十八世紀由伏爾泰（Voltaire）這班理性主義者的開創下，進入法文的。理性主義者是極其尊重理性的，所以理性的行爲就是高尚的行爲，就是文明的行爲。[15]

第二種用法的產生與第一種用法有着極密切的關係。一個人或一個社會決不會是天生文明的。一個人或一個社會最早的狀態，我們不妨稱之爲「原始」狀態。一個文明社會所生的嬰兒，最初也不是文明的，而是受了另一些文明人的教育而成爲文明人的。同樣的，一個文明社會最初也不是文明的，但是因爲社會中一直有「文明」這種因素，所以世代相傳仍能成爲文明社會。可是最初的文明社會一定是由原始社會演變而成。所以，「文明」代表人類行爲進化的一個階段。在這裏，「文明」是用來與「原始」對立。我們暫時不理會「原始社會」是如何演變成「文明社會」的。這是十九世紀在進化論下一個普遍流行的觀念。

第三種「文明」的用法，純粹是日耳曼人的發明。十七、十八世紀是法國的全盛時代，法國的語言嚴重地影響到日耳曼人的語言，一些十八世紀的日耳曼文士爲了維護日耳曼語（即後來的德語）的純粹性，爲了畏懼日耳曼語爲法語同化的趨向，起而强調他們民族的獨特性，他們與其他民族的差異，於是他們推出日耳曼人的「文明」，與法國相對抗。那時候的「法國史」就是一部「日耳曼史」，就是一部「歐洲史」，就是一部「人類通史」，人類文明的進步史。日耳曼人認爲文明的進步不應該整體而論，而應該分別研究日耳曼文明，羅馬文明，希伯來文明，中國文明，或埃及文明的興衰。儘管在這種情況下「文明」的定義仍然不清楚，但是至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美國大學中與高中却出現了「西方文明」，「美國文明」與「世界文明」等課程。所以在這種情形下，「文明」有明顯的比較意味。第三種「文明」的用法是受到民族主義的鼓舞。

這三種不同的用法，使我們對「文明」一詞不能產生單純的了解，混淆了我們對「文明」的觀念。事實上，本文中的「文明」一詞的是屬於第二種用法，即研究人類進

[15] 參看1975 *Encyclopedia Americana* 的 Civilization 條，本條係芝加哥大學名史學教授 William H. McNeill 所撰。W. H. McNeill 著作等身，其著作多有其個人見地，深富啓發性。他所著 *The Rise of the West* 一書（1963），曾獲美國 National Book Award，爲學界所推崇。McNeill 在 Civilization 條，根據 Civilization 一詞的起源說成有三種 meanings。我不太贊成將 Civilization 的起源說成 meanings。但是 McNeill 解釋 Civilization 一詞的三種不同使用，却仍然有助於我們對 Civilization's meaning 的了解。我採取了 McNeill 的 Civilization 一詞的起源論，但是參雜有我自己的分析與見解。

化的一個階段。當然，今日學者對「進化」一詞也有不同的意見，就我個人的看法而論，「進化」仍然是歷史發展的一個重要脈絡，它可以表現在思想，技術，與行爲上。本文就是要探測美索不達米亞如何由原始社會轉變到文明社會的。但是「文明社會」中的「文明」與第一種中的「文明」意義是不同的。所以這裏的「文明」必須有它自己的詮釋。

偉大的中國學者胡適之博士，在民國十五年（1926）寫過一篇叫做「我們對於西洋文明的態度」[16] 的文章，他在這篇文章中曾給「文明」一詞下過定義，他說：「文明(Civilization) 是一個民族應付他的環境的總成績」。[17] 照以上「文明」的三種用法而言，胡適之博士所用的「文明」一詞是屬於第三種用法，他是以民族作爲單元的。可是他所說的「總成績」是什麼呢？「總成績」是以什麼標準來結算的；胡先生並沒有使用一種具體的而可見的標準，他的定義失之於籠統，是失敗的。

我們再來看另一位學者對於「文明」一詞所作的解釋。這位學者是美國芝加哥大學東方研究所著名的史前史家布瑞德伍教授 (Prof. Robert J. Braidwood)。他在「史前人」(Prehistoric Men)[18] 一書中曾給「文明」下過定義。他說：「文明的意思就是都市化，就是有都市的事實」，他接着說：「都市化就是有政治組織，有法令規章，有公共建設；如道路、港口、灌溉系統等，有藝術作品、有書寫文字、有道德秩序等的出現在社會中」。他認爲「宗教與人類的最初社會是不可分的」，所以宗教也是文明社會的一項特徵。他說「文明的出現即代表一個社會具備這些個條件，這些個條件（或因素）的發展在每個社會中不盡相同，因此造成了不同社會的不同文明」。[19] 布瑞德伍教授的解釋比胡適之博士的解釋顯然要具體，有一種可見的標準，然而，我們還是要問，布瑞德伍教授對「文明」所作的解釋能適用於「美索不達米亞文明的誕生」中的「文明」二字嗎？美索不達米亞文明出現時的確有都市的出現以及他所說種種的出現，但是當「埃及文明」與「中國文明」誕生時，都市化並不是這些文明誕生時的一項重要條件。所以「美索不達米亞文明的誕生」中的「文明」，不適用於「埃及文明的誕生」與「中國文明的誕生」。布瑞德伍教授對「文明」所作的解釋，雖然概括了「文明」一詞的第二種

[16] 胡適文存第三集，卷一，臺北，1961，第二版。

[17] *Ibid.*, p. 1.

[18] 7th ed., Illinois, 1967.

[19] *Ibid.*, p. 136-137. 李亦園先生（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所長）在民國六十三年六月二日參加思與言雜誌社與食貨月刊社聯合主辦的「社會科學與歷史學」座談會發言時，曾引述了 Robert J. Braidwood 與 Gordon Wiley 合編的 "*Courses toward Urban Life*" (1963) 一書中 "Civilization" 的定義。李所長所引述的 Civilization 的定義與 Braidwood 在 *Prehistoric Men* 中所說大同而小異。李所長所强調的是：「這樣的定義很明顯與前此僅以有否文字的證計作爲文明的標準頗有不同」。李所長是站在人類學家的立場，特別注意人類學家與歷史學家的差異性。李所長發言的全文請參閱食貨月刊復刊第四卷第九期第13頁至17頁。有關 Civilization 部分則見於第15頁至16頁。食貨月刊復刊第四卷第九期是民國六十三年十二月出版。

用法和第三種用法，他所作的解釋祇有適用於美索不達米亞文明。其實，他的「史前人」的一書，就是討論「文明」在美索不達米亞出現的過程，他是以美索不達米亞文明出現時的種種現象，作爲「文明」一字的準繩。布瑞德伍教授最大的錯誤還是不能拋棄語源學的觀點——「文明」(Civilization) 從「城市」(City) 演發的觀念。

我們再來看一位英國史前史家烏爾勒爵士 (Sir Leonard Woolley) 對「文明」一字所作的解釋。烏爾勒之著名在於他在1920年代發掘的烏爾城 (Ur)，他的「迦爾底的烏爾」(Ur of Chaldees, 1929) 與「烏爾的發掘」(Excavations at Ur, 1954) 已成爲近東考古學上的經典之作。1954年，烏爾勒被邀請參加「聯合國教育科學文化組織」(UNESCO) 籌劃的「人類史：文化與科學的發展」(History of Mankind: Cultural and Scientific Development) 的撰著工作。被「聯合國教育科學文化組織」邀請參加該書撰寫的學者，都是當時世界上學術界的知名之士。烏爾勒負責撰寫第一卷的第二部份——「文明的淵起」(The Beginnings of Civilization)。這本書在1960年完成，烏爾勒於同年逝世。1963年「文明的淵起」一書由「聯合國教育科學文化組織」出版，1965 年本書爲美國的「新美國圖書出版公司」(The New American Library Inc.,) 列爲「前導叢書」(Mentor Book)，以袖珍平裝本發行，廣爲知識份子參考閱讀。

烏爾勒在「文明的淵起」一書的作著自序中說：『就語源學的觀點而論，「文明」這個詞的確是有都市化的社會的意思，而且，這也是大家所一致公認的。不過，因爲都市化這個詞本身的意義就很籠統，所以實際上它也不足以作爲任何詞的界說。因此，我們必須借助於其他的事物來界定文明。我認爲界定文明最合適與最容易分辨的標準，是看一個社會有沒有書寫藝術的知識，正如高登·柴爾德教授 (Gordon Childe) 在一篇出色的論文「文明、城市、與鄉鎮」(Civilization, Cities and Towns) 中所說，「文字不僅是代表傳遞人類經驗與累積人類知識的新工具，而且也是一個新奇的社會經濟組織——都市——的徵兆。」』[20] 烏爾勒的解釋就比較實在得多。烏爾勒所設定的文明基準，是具體的，也是可見的。從這個基準出發，我們可以說，當一個社會出現文字的時候，就是出現文明的時候。所以我們在研究一個原始社會時(無論是史前的與現代的)，發現該一社會有簡單的宗教觀念，倫理思想，部落組織，生產方法，和房舍建築，而祇缺乏書寫藝術(而不是一些不能演進的簡單符號)時，我們稱之爲某種文化 (Culture)，而不名之爲某種文明。沒有文字的非洲人和臺灣山地人，以及其他今天世界上沒有文字的民族，都不妨有他們的文化，但却沒有他們的文明。文字代表了一個社會是否能迅速發展的一個重要條件。一個社會靠它的文字才能把它社會中的人們經驗與知識傳遞下來，並發揚光大。所謂「發揚光大」，我們不妨修改胡適之先生對文明的定義來作爲它的

[20] Sir Leonard Woolley, *The Beginnings of Civilization*, New York, 1965. p. 45.

註脚，那就是「文字出現以後，一個民族應付他的環境的總成績」。所以，一個有文字的社會的一切成就，卽是它應付環境的總成績，卽是文明了，因此，文字的出現卽是文明的出現。一個民族在文字產生以後，應付他們的環境所產生的結果，卽是某個民族，或是某個地域的文明，如美索不達米亞文明，埃及文明，印度文明和中國文明。文字的使用是思想力有系統的發揮，所以文明與人類智力有系統的活動是有密切的關係。我認爲烏爾勒的對文明所作的解釋，不僅是具體的，可見的，和不可爭辯的，而且是有遠見的和實用的。「美索不達米亞文明的誕生」中所使用的「文明」，卽是依據烏爾勒所設定的基準。本文的重點卽在說明美索不達米亞文字出現的經過和文字出現前的社會變遷。

三

二十世紀的考古學及其有關的科學雖然相當進步，但是以它們目前的成績仍不足以說明舊石器時代人類在美索不達米亞的活動。所以，今日的學者們對舊石器時代人類在美索不達米亞的活動，並沒有太多的了解。不過，大多數的考古家與史前史學家大多數都認爲，美索不達米亞之出現人類，當在10萬年前與15萬年前之間。[21]

10萬年前，美索不達米亞的氣候與歷史期(所謂歷史期是指有文字出現以後的時期)的時候是迥異的。那時候大部份的歐洲爲氷河覆蓋。從大西洋沿岸至伊朗一帶的雨量，遠較今日的雨量豐富。這一帶好似一個龐大的公園，動植物的種類繁多，其中有已行採食的舊石器時代的人類。[22] 考古家已在底格里斯河上游一個叫做巴爾達·巴耳卡(Barda Balka)的地方發現了石製工具，以及大象與巨鹿的遺骸。[23] 從這些遺物判斷，那時候動物遠較人類的數量爲多。

除了巴爾達·巴爾卡之外，在此一地區還發現了三個舊石器時代末期的洞穴遺址。它們分別是札爾塞(Zarzi)，哈札爾·莫兒德(Hazar Merd)，與帕爾佳拉(Palegawra)。札爾塞，與哈札爾·莫兒德相當於歐洲舊石器時代末期的穆斯特爾文化(Mousterian Culture)與奧雷納克文化(Aurignacian culture)。[25] 而帕爾佳拉則稍晚。

---

[21] H. W. F. *Saggs, The Greatness that was Babylon*, New York, 1962, p. 28.

[22] *Ibid.*, p. 38.

[23] 巴爾達·巴耳卡地方石器是在1949年發現的，發現者爲 Dr. Naji-al-Asil。1949年，他是 Iraqi Department of Antiquities 的 Director-General。參看 Roux, *Ancient Iraq*, p. 50-51.

[24] Saggs, *op. cit.*, p. 28 札爾塞洞穴與哈札爾·莫兒德二洞穴是 Miss Doroth Garrod 在1928年發現的，帕爾佳拉洞穴是1949年由芝加哥大學的 Bruce Howe 發現的。參看 Roux, *Ancient Iraq*, p. 52.

[25] Saggs, *op. cit.*, p. 28, 穆斯特爾文化是指西元前4萬年與2萬5千年之間的歐洲舊石器時代文化，穆斯特爾(Le Moustier)是法國境內一處舊石器時代末期的遺址，著名的 Neanderthals Man 就是這一時期的史前人。他們住在洞穴之中，能縫製衣服，是好的獵人。他們將食物與死者一併埋葬，可能已有一點來世的信仰。奧雷納克文化是指西元2萬5千年至1萬8千年之間的歐洲舊石器時代，奧雷納克(Aurignac)仍然也是法國境內一處舊石器時代的人類遺址。著名的 Cro-Magnon man 就是這一時期的史前人。他們已有一些特製的工具，如鑿子、錐、刮刀、細骨常用來做針及尖器。他們的繪畫與雕刻也相當進步。

從這些遺址的動物遺骸看來，那時候的人類已獵取大動物爲食，並且知道用火，不再食生肉了。[26] 這種狩獵生活維持到中石器時代。在中石器時代，舊石器時代的草原發展成林木茂盛的森林。大羣的馴鹿、野牛、巨象之類的大動物滅亡了，新生的是軀體較小的鹿和猪。因此，中石器時代的人行獵比較困難了，但是，這時期却有二大發明協助他們。一、弓與箭；二、狗爲人類所豢養。弓與箭的發明，一說是起源於舊石器時代末期。[27]

考古家在近東地區所發現的中石器時代的遺址有二處。一是在美索不達米亞的北部的卡里姆·沙漢爾 (Karim-Shehir)；一是在巴勒斯坦的納杜菲 (Natuf)。前者稱卡里姆·沙漢爾文化 (Karim-Shehir Culture)，據放射性碳定年法，這文化的生命期約在西元前 9,000 年至 8,000 年之間；後者稱納杜菲文化 (Natufian Culture)，據放射性定年法，其生命期約在西元前 8,500 年至 7,500 年之間。

卡里姆·沙漢爾位於底格里斯河上游，札格洛斯山的山區，即伊拉克的東北地區。卡里姆·沙漢爾遺址，不像舊石器時代的遺址，是一處山洞，它是一個露天遺址。考古家在卡里姆·沙漢爾遺址中發現了大量的細石器，作葉狀或幾何圖形，但並未發現石鎌刀(flint sickles)，可是却發現了臼狀研磨器與手磨的破片，以及石鋤或石斧的碎片。此外，還有念珠、垂飾、環戒、手鐲等飾物，這些飾物的材料都是一些比較珍貴的石頭。骨製的尖狀物和針在這遺址上也出現過。從出土的動物骨格看來，羊已是人類所豢養的家畜了，其他的，如牛、馬等，似乎也被人類所豢養，我們說「似乎」，是因爲沒有確切的證據可作證物。卡里姆·沙漢爾遺址並未發現任何人類可食的穀物作物的遺跡。[28]

納杜菲文化基本上是一狩獵文化。因爲在納杜菲遺址中發現了大量的箭，箭頭都是尖銳的細石塊。遺址中也發現了石鎌刀，這似乎可以說明他們已經開始割草了。不過，現在尚無證物可以證明他們所割的草是人們種植的穀類作物。在這個遺址中，還發現了

---

[26] Saggs, *op. cit.*, p. 29.

[27] 參見1972年版 *World Book* 的 Prehistoric Men 條中的 The Middle Stone Age 項。Prehisteric Men 條爲美國學者 Carleton S. Coon 所撰，他是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University Museum 的 Anthropology 部門的 Research Curator，以及 Harvard University Peabody Museum 的 Ethnology 部門的 Research Associate.

[28] Roux, *op. cit.* p. 55. 並參看：
Saggs, *op. cit.* p. 31.
Grahame Clark, *World Prehistory: A New Outlin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9. p. 85.
Jacquetta Hawkes, Prehistory, New York, 1968. p. 255-256. 這是聯合國教育科學文化組織所編纂的 *History of Mankind: Cultural and Scientific Development* 一書的第一卷的第一部分。第二部分是 Sir Leonard Woolley 所編著的 The *Beginnings of Civilization.*
James Mellart, *Earliest Civilization of the Near East*. New York, 1970. p. 19-22.
Robert J. Braidwood, *Prehistoric Men*. 1967, p. 104-108.

用以搗碎穀皮的杵與臼、磨等物，這些器具多少與植物有關。再者，納杜菲人也豢養狗，狗是人類最早的幫手。狗可能在人類居住地附近覓食時，爲人類所豢養，看守門戶，後來才用於狩獵。他們似乎也豢養羊。[29]

據布瑞德伍教授的意見，卡里姆・沙漠爾與納杜菲遺址還不是人類村落的遺址，它們最多祇能算是當時人們的一種臨村性聚落，[30] 不過，我們却可以從這種臨時性的聚落得知，卡里姆・沙漠爾人與納杜菲人都已經知道簡單的和原始的農耕與豢養家畜了。他認爲這是近東人們生活方式的改變——由採食與狩獵的生活轉變到產食與畜牧的生活——的過渡時期。爲什麼在中石器時代會發生這種生活方式的變化呢？因爲西元前第九——八千紀時，第四冰期已經結束，大西洋上帶雨量的風北移，近東地區的氣候逐漸乾燥。在這個地區出現了野生的大麥和小麥，以及野生的狗、牛、羊之類的動物。[31] 中石器時代生活方式的變化是人們爲了適應環境，就地取材的結果。

因爲高地食物逐漸匱乏，使人們無法行採食生活，所以到了中石器時代末期，新石器時代初期，終於使人們漸漸由高地下移，完全採取產食的生活方式。這種生活方式改變的完成，是人類經濟史上的一大變化，著名的史前史學家高登・柴爾德稱之爲「新石器時代的革命」[32] (Neolithic Revolution)。「新石器時代的革命」一詞很容易引起一般人的誤會，以爲「新石器時代的革命」是「石器」的「革命」。其實，「新石器時代的革命」祇是指經濟生活演進的一個階段，代表農業由初發農作(incipient agriculture)演變到村落農作 (village farming)，代表臨時性的聚落演進到永久性之農業村落，代表家畜豢養之習慣化。高登・柴爾德認爲這種變化基本上是農業的，它的影響力足與「工業革命」相抗衡，因此，他稱之爲「革命」，因爲「農業革命」又發生在新石器時代，又故之爲「新石器時代的革命」。基於這個緣故，「新石器時代的革命」仍然爲大家所接受。總而言之，「新石器時代的革命」代表人類經濟生活重大的改變，這種經濟

[29] Saggs, *op. cit.*, p. 30. 並參看：
Braidwood, *op. cit.*, p. 102-104.
Mellaart, *op. cit.*, p. 22-32.
Hawkes, *op. cit.*, p. 158-159.
Clark, *op. cit.*, p. 88-90.

[30] Braidwood, *op. cit.*, p. 116-117. 並參看：
Saggs, *op. cit.*, p. 31.

[31] Saggs, *op. cit.*, p. 31.
Braidwood, *op. cit.*, p. 108.

[32] 「新石器時代的革命」(The Neolithic Revolution)一詞是英國著名的史前史學家高登・柴爾德 (V. Gordon Childe) 於1936年首先創用的。他在1936年出版了 *Man Makes Himself* 一書。此書的第五章即命名爲「新石器時代的革命」。柴爾德認爲新石器時代，人類之由狩獵和採食生活轉變爲畜牧和農耕的產食生活，是人類物質經濟史上的「大變化」。

生活方式的改變却具有重大的意義，因爲它象徵着人類的黃金時代已爲陳跡。正如舊約所說，人類從伊甸園中被趕出來了。人類在伊甸園裏那種種自由自在，伸手就可取食的日子已一去不返，自此以後，人類得依賴他自己的血與汗來覓食了——要爲他的食物勞心勞力。[33]

四

毫無疑問，「新石器時代的革命」對人類生活的改良有極大的貢獻。農業的發展使糧食的生產增加了，人類比過去有着更穩固的糧源。但是，農業的開始至「文明」的肇造之間仍然相距有4千餘年。農業的發生約在中石器時代的末期，新石器時代的初期，西元前7千年左右。美索不達米亞「文明」的出現是在新石器時代的末期，西元前3千年左右。說得更確切一點，新石器時代初期美索不達米亞人已經懂得種植穀物和豢養家畜了，在新石器時代末期，美索不達米亞出現了文字。美索不達米亞文明的開始也是近東青銅時代的開始。從西元前7千年至西元前3千年之間的4千年，是美索不達米亞文明的孕育時代。其實，西元前7千年之際，農業革命也不單純發生在美索不達米亞，它也發生在安那托利亞、巴勒斯坦、伊朗等地，但是這些地區並未出現最早的文明，所以均略而不論。我們現在祇研究文明出現最早的地區——美索不達米亞，研究美索不達米亞由農業的發生及走向文明的誕生的經過。本文也嘗試回答，爲什麼文明最早發生在美索不達米亞發生這一類的問題。儘管它的答案是見仁見智的。

新石器時代美索不達米亞的遺址，被考古家的掘很多。爲了敍述的方便，我們將新石器時代的遺址分成前期、中期、後期三類。每期選擇特色較爲顯著的文化爲代表來說明。這三期及其各自的代表性文化名稱如下：

前　期

嘉摩文化（Jarmo Culture）

漢蘇納·沙馬拉文化（Hassuna-Samarra Culture）

中　期

哈拉夫文化（Halafian Culture）

意瑞都文化（Eridu Culture）

尤卑德文化（Ubaid Culture）

晚　期

尤魯克文化（Uruk Cultur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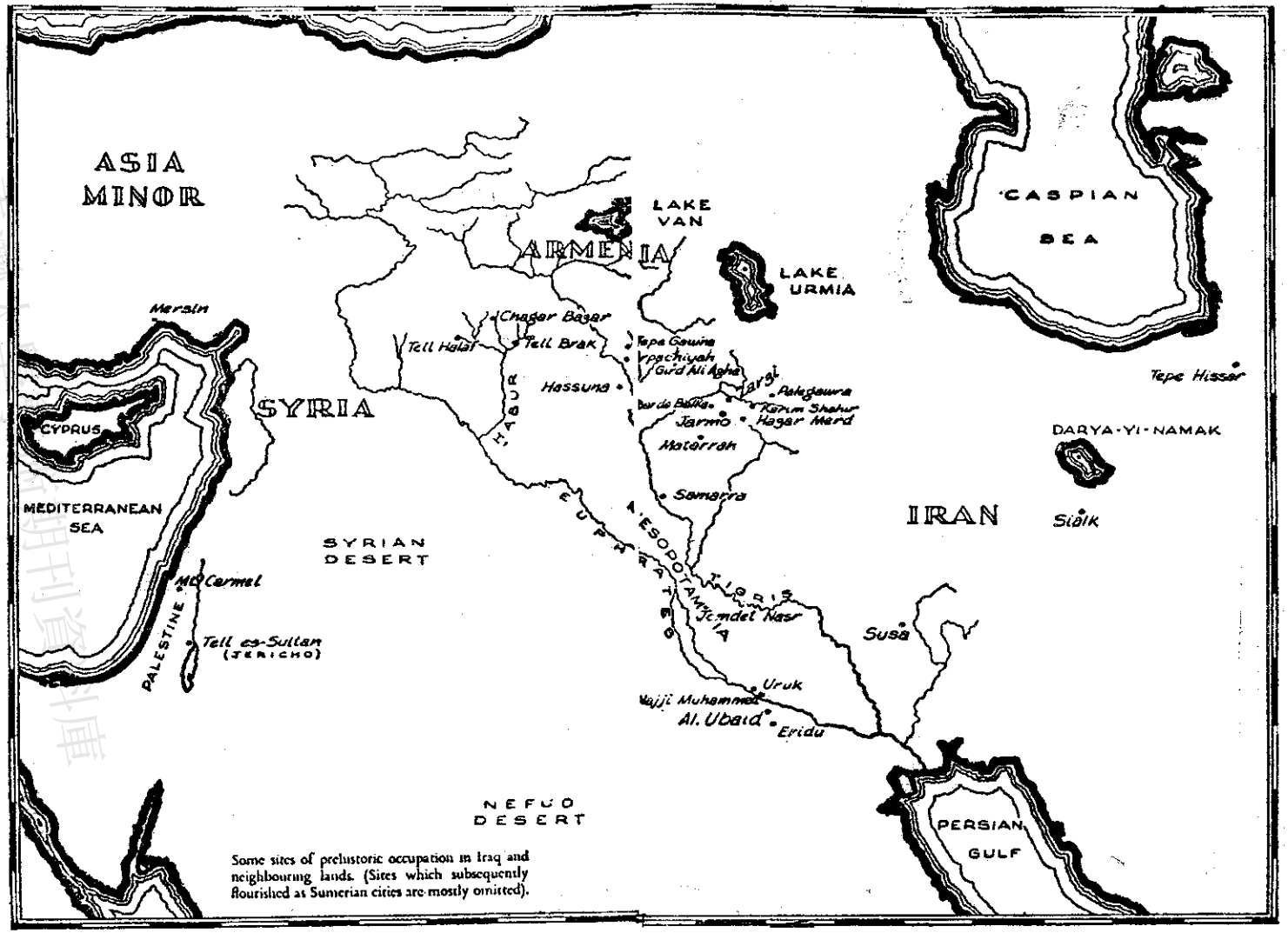
吉姆達特·納薩文化（Jemdat-Nasr Culture）

晚期又可稱爲「原型文字時期」（Proto-literate Period）

[33] Saggs, *op. cit.*, p. 29.

臺灣大學考古期刊資料庫

美索不達米亞史前時代重要遺址圖



Some sites of prehistoric occupation in Iraq and neighbouring lands. (Sites which subsequently flourished as Sumerian cities are mostly omitted).

引自 Saggs: Babylon P. XX-XXI

代表美索不達米亞新石器時代最初的遺址是在伊拉克東北部的嘉摩(Jarmo)。嘉摩遺址位於底格里斯河上游，札格洛斯山的南麓。這個遺址是由芝加哥大學史前史教授布瑞德伍於1948年掘出，他在1950～1,1955年親自主持挖掘這個遺址。[34] 根據放射性碳定年法，嘉摩文化的活動期是在西元前 6,750±200。[35]

嘉摩遺址位於山麓地帶之斷崖之上，佔地約 160 公畝，[36] 嘉摩遺址中埋藏遺物的深度達 8 公尺餘，[37] 可分爲16層，換言之，這個遺址是16個不同時代組成的。在底下的11層沒有發現陶器，陶器祇出現在最上面五層。這說明了嘉摩遺址的前11層還是處於「先陶器時代」(Preceramic Period)，[38] 後來才有陶器知識的，但是，最重要的，考古家在這個遺址中發現了農作物——一種大麥和二種小麥——的痕跡。此外，考古家在這種遺址上，還發現有燧石鐮刀，磨麥子用的臼和磨子，燒煮食物的爐，食用麥粥用的石碗。嘉摩人也豢養羊、狗，後來也養猪。雖然科學家還不敢肯定在遺址上發現的牛與馬的遺骨是人類飼養的牛與馬的遺骨，但至少證明那時牛與馬與人類的關係很密切了。嘉摩人除食用麥類與獸肉外，他們還以蝸牛爲食，他們所消耗的蝸牛，爲數甚鉅，從植物學的立場來看，嘉摩人所種植的麥類是野麥逐漸發展到熟麥的過渡階段的麥類。[39]

從嘉摩遺址上的房舍痕跡判斷，嘉摩遺址上的人家可能在20戶上下，整個村落的人口大概在 150 左右。每一戶有數間方形的房間，房子的牆是用黏泥砌的，牆基是用石塊堆成的。[40] 他們也懂得使用黏土，除了用於造牆壁之外，也用於製陶器。至於製陶器是否爲嘉摩人所發明，抑或是由外地輸入的技術，史前史家則不敢斷定了。但可以斷言的，在西元前 6 千年之後，陶器的製作成爲一種普遍的技術。他們也用黏土做成各種動物形與人形的塑像，在人形塑像中，他們最喜愛的題材，是懷有身孕的婦人。這種母性塑像之多，說明嘉摩人有濃厚的繁殖觀念。仍一方面，嘉摩人製造燧石刀(flint blades)與細石器的傳統仍然很盛。嘉摩人的細石器很多是由黑曜石所製成，但是黑曜石的產地距嘉摩最近之處，也有 500 餘公里。這或許說明了嘉摩人活動的範圍，不限於嘉摩方圓數十平方公里之內，也可以說明嘉摩人已與外地有了貿易的行爲。[41]

因爲嘉摩遺址出現了穀物、村落、及家畜等的遺跡，於是被認爲是新石器時代最早的農業村落。農業村落的出現代表「新石器時代的革命」的開始。而嘉摩文化就是「新

[34] Roux, *op. cit.*, p. 55.
[35] Braidwood, *op. cit.*, p. 117.
[36] *Ibid.*, p. 118.
[37] Mellaart, *op. cit.*, p. 47.
[38] *Ibid*; p. 47.
[39] Braidwood, *op. cit.*, p. 118.
[40] *Ibid.*, p. 118-120.
[41] *Ibid.*, p. 12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石器時代的革命」的最早成就。嘉摩文化說明了美索不達米亞人已由原始的狩獵採食生活轉變到農耕的產食生活了。在新石器時代的初期，美索不達米亞人發展成爲定居的農耕者，靠他們的技術，辛勞地從事生產，不必爲覓食而四處奔波，席不暇煖。不過，他們的生活也相當地靠一點運氣，因爲他們克服自然環境的能力仍然相當薄弱。他們以穀類爲主食，以黏土爲屋，以石器爲工具。他們也豢養牛、羊。奶食、肉食與皮毛均不虞匱乏。各家有各家的農地，各家耕作自家的農地，飼養自家的家畜，製作自家所需要的器具。或許幾戶人家合組成一個小村落，這種小村落就成了最原始的社會組織。這種原始社會組織因爲照顧與保衛土地的需要而逐漸發展爲較複雜的社會組織了。

新石器時代的革命——農業革命——爲什麼發生在近東呢？布瑞德伍教授提出「核心地域論」來解答這一問題。所謂「核心地域論」(Nuclear Area)，照布瑞德伍教授的解釋，是一個具有各種不同的野生動物和植物的自然環境。這自然環境中的動物和植物都可以爲人類所馴服和培養，爲人類所控制和掌握。這樣一種自然環境，他稱之爲「核心地域」。他說，一個「核心地域」雖不一定會造成產食的生活方式，但是一個沒有野生動物和植物的自然環境則絕不會造成產食的生活方式，所以「核心地域」是產食生活出現的先決條件。他認爲世界上有好幾處核心地域，而近東就是其中之一。[42]

近東的「核心地域」在伊朗、伊拉克、土耳其、敍利亞、與巴勒斯坦各地區之間的山麓地帶，卽海拔 300 公尺至 450 公尺之間的山麓地區。[43] 海拔 300 公尺以上的山麓地帶，年雨量在150厘米與300厘米之間，在灌溉技術尚未發明之前，這種降雨量正足以維持植物的自然成長。所以種植在山麓地帶的作物，不需要灌溉，就可以在大自然中生長成熟。低於300公尺的地區，年雨量甚少，氣候炎熱乾燥，布勒斯特德教授 (Professor James Henry Breasted)雖因其土地肥沃而稱之爲「肥沃月灣」(fertile crescent)，但却不適於農作物的自然成長。美索不達米亞三角洲卽「肥沃月灣」的一部分，這些冲積平原地區要發展農業，則需等待人類懂得灌溉技術之後。高於海拔 450 公尺以上的山區和高原，因爲地勢太高以及土地崎嶇不平，也使農作者望而却步。嘉摩遺址就是一個位於山麓地帶的新石器時代初期農業村落的遺址。所以，布瑞德伍教授的「核心地域論」確是目前比較能被接受的一種解釋。何況今天的科學家證實，現代近東的自然環境，與8,000年或10,000年以前的自然環境大體是雷同的。今天在近東的山麓地帶，仍然兩種野小麥和一種野大麥繁殖着，而且也有野羊與野猪的出沒，「核心地域論」得到更强有力的證明。[44] 嘉摩文化代表美索不達米亞人已由採食生活方式走向產食生活方式了。

[42] *Ibid.*, p. 94-95.

[43] *Ibid.*, p. 96.

[44] *Ibid.*, p. 95-9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在嘉摩文化與蘇美文明之間，人類技術的進步是有線索可以追尋的。嘉摩文化代表人類最早的農業村落的出現。嘉摩以次的美索不達米亞其他遺址的文化可以充份地看出農業村落文化的逐漸充實與豐富，以及農業由美索不達米亞山麓地區傳佈至美索不達米亞三角洲的過程。下面，按照各遺址放射性碳定年法的所測得時序的先後，陸續說明人類技術的進步。[45]

時間上僅次於嘉摩文化，但在意義上同樣重要的是漢蘇納一沙馬拉文化。漢蘇納(Hassuna)與沙馬拉(Samarra)是兩個遺址的名稱，在文化的發展上，有某種的相類性，在時間上彼此又很接近，故稱之爲漢蘇納一沙馬拉文化。漢蘇納位於伊拉克境內，底格里斯河上游。這個新石器時代前期的遺址是由伊拉克古物管理局(Iraqi Directorate of Antiquities)在1943～4年間發掘出來。[46]根據放射性碳定年法，漢蘇納遺址兩件古物的年代分別是西元前5,100與5,600±250。[47]所以漢蘇納文化應屬於西元前第六千紀。

漢蘇納是一個初民的村落，在這個遺址上，有重疊過六次的房屋的遺址。最上一層的房屋面積較大，而且建築方式亦比較進步。這些房屋，在形狀上與建築材料上，與今天伊拉克北部的農家相似。房屋分成兩部分，一部分是起居間，一部分是厨房，儲藏間之類的房間。牆壁用晒乾的磚造成，房間的地是由麥楷與黏土合成。穀類存放在屋中的地洞，麵包亦用爐火烘焙。此外，漢蘇納遺址也發現石鐮刀、石鍬、石臼、螺紋紡錘，以及手工粗糙的小人像。房屋中亦有裝置小孩屍骨的大甕，而大人的屍骨凌亂地散佈在屋角落。[48]漢蘇納的遺物，大體上，與嘉摩遺物很類似。不過，漢蘇納的陶器都有紋飾，所以它可以代表一個比較進步的文化。

漢蘇納文化一大特色，是它的陶器種類複雜。漢蘇納陶器可以分爲三類。一、古拙形(archaic)；二、標準形(standard)；三、沙馬拉形(samarran)。古拙形的陶器出現在第一至第三層遺址中(最底下的一層是第一層)。古拙形的陶器主要是甕(如同瓶)與鉢(如同碗)。但是因爲它們的形狀質地，與紋飾不同又可分爲三種。第一種是質地比較粗糙，形狀類似水梨的甕。這一類陶器在西亞各地的新石器時代的遺址都有發現，所以很難斷定這一類陶器究竟起源於何處。第二種是質地比較精緻的鉢，這種陶器都用石器或骨器擦摩過，所以表面光滑。並且因爲用火的方法的不同，所以有從淺黃到深紅到赤黑各種不同的顏色。據考古家研究，這一類的陶器是從伊拉克之西敍利亞與土

[45] 蘇美文明(Sumerian Civilization)即是美索不達米亞文明的初期文明。蘇美是在美索不達米亞三角洲的南部，文明最初是在這個地區誕生的，故亦可稱之爲蘇美文明。

[46] Roux, *op. cit.*, p. 61.

[47] Braidwood, *op. cit.*, p. 121.

[48] Roux, *op. cit.*, p. 61-6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耳其交界地區傳入的。因爲考古家在這一帶發現了大量的陶器。第三種是表面光滑而帶有紅色簡單的幾何圖案的甕和鉢。這一類的彩色陶器在敍利亞、巴勒斯坦也發現很多，所以彩色陶器是首先起源於敍利亞與巴勒斯坦。從以上三種古拙形陶器的分析看來，古拙形陶器在西元前第六千紀已遍佈「肥沃月彎」了。這種陶器文化的核心在地中海沿岸一帶。[49]

標準形的陶器出現在第四至第六層遺址中。標準形陶器是北伊拉克一帶獨特的產品，似乎應該是本土的陶器。這一類陶器的特徵是，器物上的紋飾在整個器物上的比例很小。紋飾的圖案也很簡單，表面也缺少光澤。陶器的種類僅有直頸瓶與平底圓鉢。整個結構雖然很生硬，但却有創意。[50]

沙馬拉形陶器在漢蘇納遺址中是與標準形混雜陳列的。這一類陶器無論在形狀與紋飾方面都是華麗優美的。因爲這一類陶器最早在沙馬拉（Samarra）發現的，所以定名爲沙馬拉形。[51] 沙馬拉陶器主要有盤、鉢、及甕等。在盤的表面上，在鉢的外緣，在甕的頸部與肩部上，不是繪上整齊，規則的水平條紋，就是畫上蟲、鳥、魚、羊、及人的像。這些像都有動作的姿態，看起來既對稱，又平穩。畫圖案的人都是頗具匠心的。[52] 這一類陶器很可能是來自彩陶的大本營——伊朗。[53] 沙馬拉形的陶器在底格里斯河的中游——自沙馬拉至尼尼微——發現了不少，但在美索不達米亞境內的其他地方則很少發現，祇有在幼發拉底河中游的一處遺址發現過。[54]

所以，從漢蘇納陶器的研究，可知漢蘇納陶器受到了美索不達米亞的東方與西方的影響。同樣地，從漢蘇納陶器的研究，也可以看出美索不達米亞人的藝術才能，美索不達米亞人一方面受外來的刺激，一方面出於自己的藝術天賦，創造了美索不達米亞文化的另一個重要階段，繼續了文化的發展。[55]

除了陶器之外，史前史家對漢蘇納文化所知不多。他們由漢蘇納遺址出土的手磨、石鍬、陶器、和儲存穀粒的大甕判斷，漢蘇納是一個早期的產食時代的村落。漢蘇納的石器仍舊是典型的新石器時代的石器。雖然漢蘇納亦從外地輸入黑曜石，不過，它却

---

[49] *Ibid.*, p. 62-63.

[50] *Ibid.*, p. 63.

[51] Samarra 位於底格里斯河的中游。沙馬拉形陶器的發現是在 1911 年，參見 Saggs, *The Greatness That Was Babylon*, p. 34.。因爲沙馬拉形的陶器出現在漢蘇納遺址的晚期，所以史前史家將這二處遺址文化合稱爲 Hassuna-Samarra Culture.

[52] Roux, *op. cit.*, p. 63.

[53] *Ibid.*, p. 63. Saggs, *Op. cit.*, p. 34. James Mellaart 的說法比較保留。他說沙馬拉陶器雖然很可能是由伊朗西傳的，但是也很可能是漢蘇納陶器的本身的演進結果。見他的 *Earliest Civilizations of the Near East*, p. 66.

[54] Roux, *op. cit.*, p. 63.

[55] *Ibid.*, p. 64.

臺灣大學學術資料庫

是一個封閉的和自足的經濟單元。從農具的形態推測，它是一種屬於「鍬文化」(hoe culture)的農業。所謂「鍬文化」，意卽農業作物會迅速地消耗土地的生產力，因此農作必須不斷地尋求新的地區來發展，所以，史前史家認爲漢蘇納社會多少還有點遊牧社會的性質。從而，狩獵與畜牧在食物的供給上仍然佔一個相當重要的位置。漢蘇納沙馬拉的宗教信仰仍然是繼續對母性女神的崇拜。[56] 由漢蘇納沙馬拉文化的分佈看來，所有出現漢蘇納沙馬拉文化特色的地方，都是在年雨量不足以維持農作物的自然成長，這顯示出他們多少已懂得一點灌溉技術，懂得灌溉技術是漢蘇納沙馬拉文化的另一大特徵。[57]

五

從陶器製作技術而言，哈拉夫的陶器比漢蘇納沙馬拉的陶器更進步。因爲哈拉夫期有極爲美麗的彩色陶器，陶器紋飾的圖案繁多，包括人形，動物形以及幾何形的圖案，其完美的程度在美索不達米亞的史前史上是空前絕後的。[58] 其所以命名爲哈拉夫 (Halaf)，是因爲這一類陶器最早在哈拉夫出土。哈拉夫位於結齊拉草原西部，幼發拉底河的支流哈布爾河旁。哈拉夫式的彩色陶器，不僅在美索不達米亞的西部，幼發拉底河的中上游出現，而且在美索不達米亞的東部，底格里斯河的中上游也有它的遺跡存在。[59] 它的分佈呈月灣狀。[60] 一般的學者都認爲在年代的先後次序上，哈拉夫期文化應比漢蘇納文化爲遲。它的生存期約在西元前第六千紀末與第五千紀。[61]

從哈拉夫彩色陶器的精緻來推斷，製造這種陶器的人，在其他工藝方面，一定也有相當的成就，與陶器製作關係最密切的窯，它的遺跡也發現了不少。但是在窯中燒陶需要專門的技術，所以，當時的陶工很可能是一種專業技術工人。由於哈拉夫期的陶器上，出現有戰車的圖案，所以，輪車的發明很可能在哈拉夫時期。[62]

雖然哈拉夫期的陶器是哈拉夫文化的最顯著特徵，可是哈拉夫文化在建築、宗教、工藝、商業各方面皆有相當可觀的成就。就建築而言，這時最引人注意的建築是一種稱

---

[56] Saggs, *op. cit.*, p. 34-35.

[57] Mellaart, *op. cit.*, p. 66.

[58] Roux, *op. cit.*, p. 66.

[59] ***Ibid.***, p. 64.

[60] Mellaart, *op. cit.*, p. 119.

[61] Saggs, Mellaart, Roux 等人都將哈拉夫文化置於漢蘇納沙馬拉之後，唯有 Braidwood 將哈拉夫文化視爲漢蘇納沙馬拉同期的文化。Braidwood 認爲在漢蘇納的同時，美索不達米亞的西北部，卽北伊拉克、敍利亞、與土耳其的交界處，就已成爲一個文化很發達的地區，他根據放射性碳定年法鑑定後三件哈拉夫遺物的平均的製作年代，說哈拉夫文化是西元前第六千紀，參見 Braidwood 的 *Prehistoric Men*, p. 144. 不過，Braidwood 在處理哈拉夫文化時僅用了二段不到半頁的文字。遠不如 Roux, Saggs, Mellaart 等人分析的詳盡。Braidwood 對於哈拉夫文化的產生，傳播與影響均一字不提。哈拉夫文化不可能完全孤立的文化。

[62] Saggs, *op. cit.*, p. 36.

爲「泰洛式」(tholoi) 的建築，所謂「泰洛式」的建築是指一種由一個有圓頂的廳和一個長方形的堂結合而成。由使用圓頂一事看來，他們已有了拱形圓頂的知識。「泰洛式」的建築的用處是什麼？史前史家尚無一致的結論。有的學者認爲是宗教性的建築物，有的學者認爲是「鄉公所」之類的公共建築，沒有任何一個學者認爲是人們的居所。其所以很難決定「泰洛式」建築是宗教性或是世俗性，在於「泰洛式」建築在下一文化期——尤卑德期——中幾乎完全失傳。倘若它是宗教性的建築，那末它會傳之後世，爲後代人所採用，因爲人類在宗教方面有强烈的保守性。但是，它失傳了，可見它不是宗教性建築。至於堅持宗教性建築的這一派，他們認爲，泰洛式建築之失傳，是因爲尤卑德期文化的創造者，他們不是哈拉夫文化的繼承人，他們是外來者，所以廢棄了原來的文化。因而「泰洛式」建築失傳。這一派的主張也不是沒有他們的理論根據。因爲尤卑德期的宗教信仰的確和哈拉夫期不同。[63]

哈拉夫期的遺址中，仍然有許多懷孕婦人的塑像出土，可見哈拉夫期的人民仍然保留嘉摩文化、漢蘇納文化傳統中，對繁殖的重視與尊敬。不僅如此，哈拉夫期遺址中，也出現了一些殉葬物，這多少也說明了哈拉夫期的人們有點來生的信仰。此外，在石器方面，一般的石器用具很多，不過，也有念珠、飾針，以及一些銅製品的出現。哈拉夫期的一些小村落，已有石子路、黑曜石、貝殼等的出現。黑曜石與貝殼都不是它們的本土出品，可見這些小村落與外地有了交易的行爲，這或許可以說明哈拉夫期，美索不達米亞已有一些小市鎮了。但是一般哈拉夫期的村落，仍然是農業的村落，因爲在它們的遺址中發現了麥類和家畜。哈拉夫期村落的房舍較漢蘇納期的寬大良好。[64]

哈拉夫文化大概興起於亞述，在哈拉夫文化的全盛時期，曾西傳至地中海東岸土耳其與敍利亞一帶，南傳至沙馬拉。它的分佈呈月彎形，與漢蘇納文化的分佈相類似。哈拉夫文化很可能是漢蘇納文化的進一步發展。[65]

嘉摩是位於美索不達米亞的山麓地帶，漢蘇納與哈拉夫都位於美索不達米亞的草原地帶。換言之，這些是新石器時代北美索不達米亞的農業村落遺址。南美索不達米亞，迄今爲止，尚未發現有與嘉摩文化，漢蘇納文化同期的遺址，南美索不達米亞農業最早出現的人類遺址是與哈拉夫文化同期的。它是南美索不達米亞，蘇美人 (Sumerians) 稱之爲意瑞都 (Eridu) 城市。史前史家稱這個遺址的文化爲「意瑞都文化」(Eridu Culture)。

無論美索不達米亞三角洲是何時形成，美索不達米亞三角洲之成爲人民可以居住的

[63] *Ibid.*, p. 37. Roux, *op. cit.*, p. 64-5. Mellaart, *op. cit.*, p. 121-122.

[64] Saggs, *op. cit.*, p. 35. Roux, *op. cit.*, p. 65-66.

[65] Saggs, *op. cit.*, p. 37-38, Roux, *op. cit.*, p. 67-6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地方大約是在新石器時代。考古家不曾在美索不達米亞三角洲發現舊石器時代與中石器時代人類聚落的遺址。其所以如此正如我們前面所說，美索不達米亞三角洲終年缺雨，在灌溉技術尚未被人們發現利用之前，人們自然不願意進入定居。他們寧願住在山麓與草原地帶，那兒的生活條件比較容易，人們開始在美索不達米亞三角洲定居要比在近東其他地區定居晚多了。那麼進入美索不達米亞三角洲的人究竟是從何而來呢？關於這個問題，有些學者認爲美索不達米亞三角洲最早的居民很可能來自北方的山麓和草原地帶。他們的理由有三點：一、這是因爲北部（山麓與草原）地區人口過剩，逼使北方的居民不得不向南方發展。二、灌溉技術的發明，漢蘇納時期，北方人大約已懂得灌溉，布瑞德伍教授又證明，美索不達米亞的農業是由北方向南方逐漸擴張，不懂得灌溉技術的人是無法在南方從事農業的。三、最初的意瑞都陶器和哈拉夫及沙馬拉陶器相類。所以三角洲居民來自北方一說，有它的理論根據。不過，也有一些學者認爲三角洲的居民是從伊朗高原而來，因爲在西元前第四千紀之前，美索不達米亞三角洲的氣候與伊朗非常接近，地理環境亦相似。這後一說比前一說更顯著牽强附會。總之，這是一個不易解決的問題。

雖然我們不能確定意瑞都人就是美索不達米亞三角洲眞正的最早居民，但是，在現代的三角洲考古的發掘上，尚未有比意瑞都更古老的遺址出現，在證據的支持下，意瑞都人仍可視爲三角洲地區最早的居民。縱然我們同樣不能確定意瑞都人從何而來。意瑞都的居民最初一定是一羣農耕者，因爲河流盆地氣候的需要，迫使他們挖掘溝渠，設法排水、灌溉，以助農作物的成長，他們的農業灌溉技術一定是襲自北方。既然要在平原之上挖溝渠、排水、灌溉，所需要的人力自然比山麓地帶與草原地帶的農村來得龐大。因此，比新石器時代前期更大的社會組織開始出現。西元前第三千紀三角洲地區的城邦組織的淵源可能導源於此。[66]

意瑞都的遺址上，曾挖掘出一個意瑞都居民早期所建的一座小神廟。這個造小神廟的地點必定非常神聖，因爲自意瑞都期之後至西元前第三千紀末，在同一地點所建造的神廟被考古家所發掘的幾近二十（一個造在另一個之上）。[67] 神廟是西元前第三千紀，蘇美文明的重要表記之一，意瑞都出現西元前第三千紀蘇美文明中的原始神廟，因此，意瑞都文化與後期的蘇美文明一定是有某種關係的。[68]

在意瑞都文化之後，三角洲另一個重要的新石器時代中期的遺址是「亥吉·穆罕默德」(Hajji Muhammad)。「亥吉·穆罕默德文化」的生存期約在西元前 4,750 年至

[66] Saggs, *op. cit.*, p. 38.

[67] Roux, *op. cit.*, p. 67–68.

[68] *Ibid.*, *op. cit.*, p. 68. Saggs, *op. cit.*, p. 3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4,350年之間。「亥吉·穆罕默德文化」中的建築都很簡單。創造「亥吉·穆罕默德文化」的人很可能是來自伊朗西南部，但是他們的陶器製作也受到一點哈拉夫的影響。「亥吉·穆罕默德文化」分佈到三角洲的大部分地區。「亥吉·穆罕默德文化」的重要性在於它是「尤卑德文化」的先導。尤卑德文化可以說是自「亥吉·穆罕默德文化」蛻變出來的。[69]

尤卑德文化 (Ubaidian Culture) 的生存期是西元前 4,500 至 3,750 年，或許還可以上下伸縮 200 年。[70] 尤卑德文化的出現，代表美索不達米亞在新石器時代中期進入一個嶄新的和最重要的文化發展階段。[71] 因爲尤卑德文化是第一個遍佈全美索不達米亞的文化。它一方面顯示了與山麓草原地帶文化的差異，一方面顯示了若干蘇美文明因子的萌芽。尤卑德文化之所以能顯示與山麓與草原地帶文化的差異，因爲它是在三角洲地區發展成熟的，是三角洲文化的代表。

「尤卑德文化」上承意瑞都文化和亥吉·穆罕默德文化的灌溉技術，所以這個文化的經濟基礎是灌溉的農業經濟，灌溉技術在尤卑德期發揮重大的作用。[72] 既然是農業經濟的社會，「黏土與蘆葦」便成爲很廣泛使用的原料。黏土與蘆葦在三角洲地區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而石塊則稀少，需從外地輸入。因此，除少數重工具，尖銳的葉狀刀，和個人的裝飾品用石器製造外，其他的各項物品，諸如杵、鐮刀、斧、子、刀等皆以黏土爲料。用黏土做成的母性女神塑像很多，這時也有男性塑像。大多數房屋則用蘆葦爲頂，爲壁，用木棍爲架，壁上間亦採用黏土。但亦有採用泥磚爲建築材料的。用泥磚作建築材料的多係比較精巧的神廟。例如，意瑞都遺址中屬於尤卑德期的一座神廟，即是由大泥磚砌成。這座大神廟，呈長方形，長方形的中央是內殿，四角各有一小間房屋。內殿的兩端靠牆處，分別有供神像的泥壇一臺，及供神物的祭壇一臺。其牆壁間有空隙，藉以採光。這一類的神廟在蘇美神廟中很普遍。[73] 意瑞都尤卑德期的神壇中留下了魚骨這樣的祭物，足見魚是用來祭神的，用魚來祭神，也可見捕魚在當時經濟上的重要性。既然意瑞都的神要用魚祭，可見意瑞都的神與水有密切的關係。證之蘇美期的意瑞都是水神的主城，此說甚是。由此點引申，後來的蘇美文明的因子已存在於尤卑德文包中了。[74]

尤卑德文化的特徵仍然是彩色陶器。黏土的顏色常在淺黃與深綠之間變化不定，其彩色則因燒烤過度，多是深褐到藍黑。器物上僅有一部份有紋飾，紋飾的圖案多係幾何

[69] Melleaart, *op. cit.*, p. 68, p. 129. Saggs, *op. cit.*, p. 38-39.

[70] Melleaart, *op. cit.*, p. 129. Braidwood, *op. cit.*, p. 148-150.

[71] Saggs, *op. cit.*, p. 39.

[72] *Ibid.*, p. 39.

[73] Roux, *op. cit.*, p. 69.

[74] Saggs, *op. cit.*, p. 39-4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線條或者一些不規則線條，缺乏想像力。最普遍的陶器是鉢與瓶等，這一類陶器遍佈美索不達米亞地區。[75] 尤卑德期的陶器與沙馬拉、哈拉夫，甚或是意瑞都，亥吉·穆罕默德等期的陶器比較，尤卑德期陶器不及它們的精緻。其所以如此，可能是大量生產的關係，做工不及過去的細膩了。[76]

尤卑德文化由三角洲地區向北方的山麓地帶及草原地帶傳佈的速度一定很快，因爲北方大多數正在盛期的哈拉夫藝術突然中斷了，某些代表宗教象徵符號在沒有任何衰亡的期間下，陡然消失了。三角洲文化之所以向北方傳佈，可能是因爲南方社會人口過剩，向北方移民的結果。這些南方來的移民，在北方可能以征服者身份定居，因此，很快的消滅了北方文化。[77] 但是北方人並沒有完全被消滅，因爲在北方的高拉(Gawra)遺址中屬於尤卑德期的地層中仍然發現哈拉夫期的建築物——泰洛式的建築物。高拉遺址中尤卑德期的陶器仍然有人物形和動物形的紋飾。[78] 高拉遺址除顯示了尤卑德期北方仍保留一點點他們傳統外，也顯示了北方文化在尤卑德期其他方面的進步。如石器與石製平印章(stamp-seals)的數目很多，石平印章上仍彫有動物形和人物形的圖案。如銅製品的出現，數目雖不大，却饒有意義的，它代表近東已進入銅石器時代(Chalcolithic Age)。高拉遺址之出現銅製品，這可能是因爲高拉距離銅的產地亞美尼亞(Armenia)與高加索(Caucasus)較近。[79]

在尤卑德期，哈拉夫期的「泰洛式」建築普遍地消失，哈拉夫期的人形和動物形的紋飾普遍地廢棄，尤卑德期的意瑞都地層找不到母性女神的塑像等現象，說明了尤卑德文化不是哈拉夫文化的後繼者，這也說明了尤卑德人不是從北方來到三角洲地區的。尤卑德文化雖然有南北地方上的少許差異，但是，基本上，尤卑德期的美索不達米亞文化有它的一統性。在尤卑德期的建築物中，神廟是最大的建築物和最好的建築物。這種建築物的形式一直繼持到蘇美文明時期。[80] 地方上既然有神廟的存在，那末祭司也一定出現。祭司除負責宗教方面事務外，也可能要擔任一些政治和經濟方面的工作。所以神廟就成爲地方上的宗教、政治、與經濟事務的中心。因爲灌溉技術的發展，灌溉的工作必不是某些個人所能完成的工作，因此社會的組織必日益加强，社會也隨之複雜。[81] 尤卑德以神廟爲中心的市鎮可能是以神廟爲中心的城邦的淵源。而尤卑德式的市鎮上承了意

[75] Roux, *op. cit.*, p. 69.

[76] Braidwood, *op. cit.*, p. 146.

[77] Melleaart, *op. cit.*, p. 129-30. Roux, *op. cit.*, p. 70.

[78] Saggs, *op. cit.*, p. 40. Roux, *Op. cit.*, p. 70.

[79] Roux, *op. cit.*, p. 70.

[80] *Ibid.*, p. 71.

[81] Braidwood, *op. cit.*, p. 14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瑞都小市鎮的餘緒。尤卑德期的市鎮此後在三角洲地區普遍地發展開來。

六

自尤卑德期之後，美索不達米亞三角洲地區與山麓草原地帶文化的發展有顯著的差異。三角洲地區的文化發展很快，三角洲的南端——蘇美（Sumer）——不久就有了文明，而山麓草原地帶的文化發展，與三角洲的南端比較，似乎是停滯了，山麓草原地帶之進入文明期，那是蘇美地區進入文明期千餘年的事。本文的主要的目的，在追索文明的最初發生，故文明在蘇美之誕生，自是本文的主題。本節即討論尤卑德期之後，文明是如何在蘇美誕生的。史前史家將尤卑德期之後，歷史眞正開始前，文字出現的時期，稱之爲「原型文字時期」（Proto-Literate Period）。[82] 這個時期大約始自西元前3,500年止於西元前2,800年。因爲西元前3,500可能是美索不達米亞原始文字產生的時期，而西元前2,800時的美索不達米亞的文字和人物的活動可以被現代的歷史家所瞭解，美索不達米亞由原史期（Proto-History）進入信史期（Recorded History）。文字既在這個時期產生，根據本文對「文明」二字所下的定義，故文明是在這個時期誕生的。

「原型文字時期」又可分爲二時期。一是尤魯克期(Uruk Period)，以尤魯克文化(Uruk Period)爲代表；一是吉姆達特·納薩期（Jemdet-Nasr Period)，以吉姆達特·納薩文化（Jemdet-Nasr Culture）爲代表它們二者的分期線是在西元前3,100。[83] 茲分別說明如次：

尤魯克城幾位於蘇美的中央，現代的阿拉伯人稱之爲「華卡」（Warka）的地方。「尤魯克」一名是蘇美人的稱呼。尤魯克城的挖掘主要是德國學者領導的。尤魯克城的挖掘有二大意義。第一，史前史家與歷史學家證明了它是蘇美文明的中心，第二，它是科學的考古學成功的明顯例證。[84] 在尤魯克所挖掘出的遺物中，有四項特別值得注意，此即神廟、陶器、圓印章、和泥簡。[85] 因爲這些東西顯示出文化的進步，顯示出尤魯克期與前一文化的差異。

尤魯克期最早的神廟，在結構上與尤卑德期的神廟很相類似，它們仍然是處於尤卑德的傳統當中。不過，有些神廟的地基開始使用石塊，石塊不是蘇美地區的產物，因此，造神廟的人一定有使用石塊的知識，這種知識不是吸收進入的，就是新來的移民帶

[82] Braidwood 認爲「原型文字時期」包括尤魯克後期吉姆達特·納薩期。(見他的 Prehistoric Men, p. 150)，Saggs 的看法與 Braidwood 相同，僅 Roux 將吉姆達特·納薩期看作是「原型文字時期」。(見他的 *Ancient Iraq*, p. 78-79)。本文從 Braidwood 的分期。

[83] Roux, *op. cit.*, p. 72.

[84] Saggs, *op. cit.*, p. 41.

[85] Roux, *op. cit.*, p. 7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入的。這些新來的移民，在來蘇美之前，一定住在產石的地方，或者已有使用石頭的知識。現在仍無法證明這些新來者是從何處而來。[86] 尤魯克期最早的神廟的地基，是一個階梯形的高臺，它的四角分別向着東南西北方，這個高臺約有12公尺高。從臺基至臺頂可以拾階而上。神廟就高高地立於臺頂。在尤魯克的中期，神廟與基臺都相對的擴大，但是神廟擴大到一定的限度後，却不再擴大，而基臺却繼續不斷的擴大，因爲基壇愈大愈高，相形之下，臺頂的神廟就愈來愈小了。這是因爲人們對基壇的重視超過了廟堂。到了尤魯克末期，尤魯克的「塔廟」就成爲蘇美平原上一大奇觀了。因爲遠方的人，可以在他目力所及，遙見這平原上的神廟；倘若置身在這神廟之中，舉目四望，平原景色，可以盡入眼底。這種「塔廟」，可能就是蘇美文明中一大特色的——「通天塔」(Ziggurat) 的前身。「通天塔」是蘇美文明中典型的神廟。[87]

就陶器而言，尤魯克期陶器與尤卑德期的陶器完全不一樣，尤魯克期的陶器除了少數漆上黑色和深紅色之外，多數的陶器都不著色，而是燒出來的原色，缺乏美麗標緻之感。尤魯克期美索不達米亞陶器沒落的原因，可能是因爲銅器大量地使用——這一點，也是尤魯克期文化的特色之一。另一方面，也可能是製造陶器時，使用了拉坯輪車——這又是尤魯克期另一項發明——的關係。使用了拉坯輪車，陶器的生產大量化了，大量化的生產當然使陶器的品質降低。總之，這種陶器是不如美索不達米亞過去的陶器。當然，尤魯克陶器異於尤卑德期的陶器，也可能是尤魯克的陶器是外地輸入的，或者侵略者所帶來的。[88]

尤魯克期另一項明顯的變化是圓印章(Cylinder-seal)取代了過去的平印章(Stamp seal)。圓印章很可能是尤魯克人所發明的。圓印章是由一塊普通的石頭或較爲珍貴的石頭做成。圓印章的長度自2公分半至7公分半不等。其粗者厚度似大姆指，其細者厚度似鉛筆。圓印章的圓心部分都是中空，因此，圓印章可以用線穿起來掛在頸間。圓印章的圓柱面部分都刻上圖案，圖案的內容有動植物的全部形相或部分形相，以及日常生活的情景與神話的題材，整個圖案在設計上都富有創意，製作圓印章需要極高的才能與技巧。這種圓印章最初的目的，在保護個人的財產，因爲它可以在黏土所做的瓶罐的封口上，留下印記。歷史家可以透過圓印章上圓柱面上的圖案，了解當時人民生活的大略情形。圓印章在蘇美文明中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89]

尤魯克期劃時代的大發明是文字的創造。文字的創造與農業的發明有同樣的重要性。文字的最初使用，當然不是爲了歷史與詩歌，文藝與思想，它祇不過是爲記下神廟

[86] Saggs, *op. cit.*, p. 42.
[87] *Ibid.*, p. 42-44. Roux, *op. cit.*, p. 75.
[88] Roux, *op. cit.*, p. 76.
[89] *Ibid.*, p. 76. Saggs, p. 46-4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中的流水帳。因此，最早的文字是代表實物的圖畫，以及代表數字的符號。這些圖畫與符號都刻劃在美索不達米亞最易得到的書寫材料——泥板——上。雖然有些尤魯克的象形文字很容易看出它的意義，但是有些象形文字的圖案却簡化了，代表一些不易明白的抽象意義。因此，我們可以說，尤魯克文字已經不是單純的象形文字了，它開始由象形文字這個階段向前發展了。尤魯克的文字的筆劃呈圓形或橢圓形，與蘇美呈「楔形」(Cuneiform) 筆劃的文字頗有不同。不過，蘇美的「楔形文字」還是從這種圓形或橢圓筆劃文字演變而來，因爲書寫的工具蘆葦的莖——越削越尖的緣故。越尖的筆頭越便於在泥板上刻字。黏土與蘆葦是美索不達米亞三角洲的特產，可以隨地取用，方便之極，所以從西元前 3,000 年左右至耶穌紀元左右，盛行在美索不達米亞的楔形文字便在這種基礎上建立起來。雖然尤魯克期的及其以後的吉姆達特·納薩期的文字，都是圖象和抽象的，沒有學者能够認識它和分析它，了解它的意義，然而沒有人懷疑它是一種最古的文字，所以學者稱之爲「原型文字」(Proto-Literate)。基於文字發明是一件劃時代的大事，所以新石器時代的末期，又可稱之爲「原型文字的時期」。原型文字時期的結束，大約是西元前 2,800，因爲這個時期的文字已經是古文字學者所能認識的蘇美楔形文字了。文字的發明，代表人類眞正踏上文明之途。美索不達米亞文明的誕生是在新石器時代的末期。[90]

「吉姆達特·納薩文化」是「原型文字時期」的第二期文化，它緊接着前面的尤魯克期，後面緊跟着歷史期。它是尤魯克文化的繼續與擴散時期。自尤卑德期以來，美索不達米亞三角洲地區的南部，許多農村漸漸演變爲市鎭，在尤魯克期，許多市鎭又演變爲較大的城市，像意瑞都·烏爾 (Ur)，與尤魯克等都是這時期的大城。尤魯克期，蘇美城市化的趨向非常的明顯。到了尤魯克末期，尤魯克城本身成爲蘇美地區都市化的北界，這時候，三角洲中、北部，仍然是小農村社會。不過，到了吉姆達特·納薩期，這種情形才大大地改變，三角洲的中北部，卽巴比倫的中北部開始出現了都市，換言之，三角洲的中北部在吉姆達特·納薩期開始都市化。像尼布爾 (Nippur)、卡什 (Kish)、與埃斯魯納 (Eshnunna) 等都是這一時期出現的大城。它們的出現可能是灌溉技術普及的結果。[91]

吉姆達特·納薩期除了有顯著的都市化的現象發生外，在其他方面也有顯著的進步。文字的使用愈來愈普遍，文字中的象形符號的數目愈來愈少，象形文字形「象」的意義愈來愈淡薄，形「聲」的成份愈來愈濃厚。早期的「象」符逐漸演變成「聲」符了。神廟的建築愈來愈重視裝飾與基壇了。圓印章的製作愈來愈普遍，圖案也愈來愈精緻。

[90] *Ibid.*, p. 77-78, Saggs, *op. cit.*, p. 43-45.

[91] Saggs, *op. cit.*, p. 47-48.

所以「吉姆達特·納薩文化」與「尤魯克文化」在文化內涵上，並無基本上的差別，如果有差別存在的話，那也祇是表現在風格與品質上。[92]「吉姆達特·納薩文化」唯一的創造性的貢獻是雕刻藝術。[93] 無論是圓印章的圖案或雕刻的圖案，其題材愈來愈廣泛，但主要仍以日常生活的活動與宗教信仰的儀式爲主。[94] 至於物質文化方面，金屬的使用普遍了，種類增多了。除了銅之外，還有金、銀、錫等金屬。[95] 吉姆達特·納薩文化充份地顯示出尤魯克文化的繼續進步。

在「吉姆達特·納薩期」中，美索不達米亞三角洲的文化傳至伊朗，小亞細亞、埃及等地。埃及所顯示出美索不達米亞文化的影響是相當繁多與有趣的。這個時期埃及不僅有了美索不達米亞的圓印章，而且有了吉姆達特·納薩期美索不達米亞的建築方法。美索不達米亞藝術上的主題也出現在埃及的藝術中。例如，美索不達米亞式的船出現在埃及出土的一個刀柄上。埃及的陶罐也充份地表現美索不達米亞的影響，而埃及文字寫作的原則更明顯地可以看出它與美索不達米亞文字的淵源。美索不達米亞文化之傳入埃及，不太可能是經由敍利亞與巴勒斯坦，因爲在敍利亞與巴勒斯坦找不到考古上證據的支持。美索不達米亞文化之傳入埃及，可能是經由南阿拉伯，或是索馬利蘭（Somaliland）的沿岸，這地方是美索不達米亞商人與埃及商人的相會處。[96]

美索不達米亞三角洲「原型文字時期」的文化，雖然遠傳至伊朗、小亞細亞、埃及等地，但是却未能深入美索不達米亞的山麓草原地帶。前面曾經分析過，在尤卑德時期，美索不達米亞的文化曾經呈現一致性，但在尤卑德期之後，三角洲與山麓草原地帶文化發展的速度不同，造成了山麓草原地帶在三角洲進入文明約千餘年後才進入文明。什麼原因造成山麓草原地帶與三角洲地帶文化發展的速度的不同呢？什麼原因使三角洲的文明不能傳入山麓草原地帶呢？可能的原因是，北方仍然有一個强大的敵對文化，使三角洲的南方文化不易滲入北方的山麓草原地帶。[97] 所以，當「原型文字時期」結束，三角洲進入信史期，而山麓草原地帶仍處於史前期的無文生活狀態中。但是，也可能是由於其他各種原因。例如，山麓草原地區的人民比較保守，三角洲地區的人民比較進取；河流與溝渠的星羅棋佈，保障了三角洲地區人民的安全，使他們免於遊牧民族及高地民族的侵襲，有精神從事文明的創造；大規模的灌溉需要集結多數人的力量，導至了權力的集中，和財富的集中，所以有些農村就比其他農村富有，事務比較複雜，需要人

[92] Roux, *op. cit.*, p. 79.

[93] *Ibid.*, p. 79. Saggs, *op. cit.*, p. 49.

[94] Saggs, *op. cit.*, p. 49. Roux, *op. cit.*, p. 79-80.

[95] Saggs, *op. cit.*, p. 49-50.

[96] *Ibid.*, p. 48, Roux, *op. cit.*, p. 80-81.

[97] Saggs, *op. cit.*, p. 5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們思考之處亦較多。無論三角洲地區文化的發展，與山麓草原地帶文化的發展在「原型文字時期」是如何的不同，總之，就整個美索不達米亞而言，文明——文字却在這個時期出現了。[98]

本文從舊石器時代人類在美索不達米亞的活動，一直討論到新石器時代末期美索不達米亞文明的誕生。主要的內容，以考古的發掘爲主。透過本文的敍述，我們可以知道美索不達米亞人類的活動在新石器時代加深加劇了。他們在新石器時代第一個值得注意的活動是農業的發明，農業的發明使糧食比較能够確保。第二個值得注意的活動是灌溉的發明，使生產的面積與地域擴大，也使糧食的數量增多，當然由灌溉所引發的政治、軍事、與經濟，勞力諸問題也使社會組織複雜了。第三個值得注意的活動是由第二項活動派生的。卽社會組織之複雜化，產生了以神廟爲中心的市鎭。當然市鎭的出現，倒過來，更加深社會之分工、合作。這種社會的分工與合作必定要透過某種政治組織才能實行。在分工與合作的社會構造下，各種專業人才與組織人才出現了。由於社會的複雜、忙碌，將社會上各種極簡單的經濟活動記錄下來，乃是極其自然之事，於是乃有文字的誕生。當然文字的誕生不單是經濟活動的結果，可能還有人類的創造的天賦才能在內，不過，如果沒有經濟活動的需要，文字是不可能那樣迅速發展的。文字的產生於是表示社會發展到某種程度的需要，這種社會不一定完全是城市，像事務比較複雜的農村，如埃及的農村社會與中國的農村社會，同樣的產生文字。雖然埃及的文字很可能是從美索不達米亞吸收的，但是埃及人若沒有需要，却不會加以改造接受的。所以同樣的，因爲文字出現的原因，埃及有了埃及文明，中國有了中國文明。有了文字以後的社會，它們的進步與發展較沒有文字的社會實不可同日而語。所以美索不達米亞在「原型文字時期」之後，迅速地產生了蘇美文明（Sumerian Cirivlization）。這裏的「文明」二字是指人類有文字之後所有的活動的總成績。至於「蘇美文明」的內容是什麼則非本文所及了。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98] Roux, *op. cit.*, p. 72-73.